

广西境内语言人称系统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蒋灵卉

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DOI:10.61369/HASS.2026050026

摘 要 : 广西境内汉语、壮侗语、苗瑶语长期深度接触, 人称系统作为语言最基本的语法范畴之一, 呈现出丰富的区域类型特征。本文系统梳理广西境内语言人称系统的研究脉络, 将其归纳为汉语人称系统研究、壮侗苗瑶语人称系统调查、区域类型学理论引入三条路径。分析表明, 既有研究存在三个明显欠缺: 人称代词之外的其他名词形式缺乏系统描写; 汉语与壮侗语、苗瑶语人称系统的跨语言比较尚付阙如; 人称系统的区域分布模式及其演变动因未获专门考察。本文据此提出三个方向: 从单一人称代词描写转向多词类人称编码的整体考察, 从个案调查转向跨语言系统比较, 从特征描写转向区域分布模式与演变动因的综合解释。展望未来, 区域类型学视角下的广西语言人称系统研究有望为语言接触与区域类型学理论提供基于中国语言事实的实证范例。

关 键 词 : 广西语言; 人称系统; 区域类型学; 语言接触; 壮侗语; 苗瑶语

A Review and Prospect of Research on Language Person System in Guangxi

Jiang Linghui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4

Abstract : The Chinese, Tai-Kadai, and Hmong-Mien languages have long been in deep contact within Guangxi, and the personal pronoun system, as one of the most fundamental grammatical categories of a language, exhibits rich regional typ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research trajectory on linguistic personal pronoun systems in Guangxi and categorizes it into three approaches: studies on Chinese personal pronoun systems,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personal pronoun systems of Tai-Kadai and Hmong-Mien language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regional typology theory. Analysis reveals three notable shortcomings in existing research: a lack of systematic description of noun forms other than personal pronouns; insufficient cross-language comparisons between Chinese and Tai-Kadai/Hmong-Mien personal pronoun systems; and no dedicated examination of region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or evolutionary drivers of personal pronoun systems.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proposes three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shifting from descriptions of individual personal pronouns to comprehensive analyses of multi-word-class personal encoding; moving from case studies to cross-language systemic comparisons; and transitioning from descriptive features to integrated explanations of region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and evolutionary mechanisms. Looking ahead, research on Guangxi's linguistic personal pronoun systems from a regional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is expected to provide empirical examples grounded in China's linguistic realities for both language contact studies and regional typology theory.

Keywords : Guangxi language; person system; regional typology; language contact; Tai-Kadai languages; Hmong-Mien languages

引言

广西是中国语言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 境内分布着汉语(西南官话、粤语、平话、客家话等)、壮侗语(壮语、侗语、仫佬语、水语、毛南语等)和苗瑶语(苗语、瑶语等)三大语群, 各语言长期深度接触、相互影响。人称系统涵盖指称说话者、听话者及第三方的所有编码方式, 包括数范畴、包括/排除式、敬称系统、句法功能及领属结构等核心参项, 既是共时描写的重要对象, 也是历时演变与接触研究的理想窗口。

广西境内语言人称系统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早期调查记录, 此后大致沿汉语人称系统研究、壮侗苗瑶语人称系统调查、区域类型学理论引入三条路径展开。然而, 三条路径之间尚未有效整合。本文旨在系统梳理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史, 评估其进展与不足, 并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

项目信息: 2024年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年度项目“广西境内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人称系统的区域类型学研究”(24YYF010)。

一、汉语人称系统研究

汉语人称系统的研究可追溯至马建忠（1898）对上古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的讨论。黎锦熙（1924）《新著国语法》最早对现代汉语人称代词的范畴及三人称分类做出明确界定。然而，吕叔湘（1982）在《中国文法要略》中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上古汉语没有真正的第三人称代词，所谓的三身指称实为“对话指称”。这一分歧表明，汉语人称系统的界定从研究之初便存在不同的学术立场，也提示后人“第三人称代词有无”的问题必须放在特定历史阶段和语体类型中加以具体讨论^[1]。

范畴拓展方面，江荻（2010）分析了东亚语言人称的涉数形态，将汉语人称复数置于更广阔的东亚语言背景下加以审视，揭示了涉数形态在东亚语言中的类型多样性。王春玲（2020）、吴春亮（2021）分别对汉语人称代词复数标记进行了专题考察，前者侧重西北方言，后者侧重近代汉语的历史层次。王力（1980）在《汉语史稿》中指出上古汉语存在主格、宾格和领格的形态区分，但这一区分在中古以后逐渐消失。这些研究将汉语人称系统的考察从单纯的“三人称分类”拓展至数、格等更为精细的形态句法范畴^[2]。

基于近代汉语文献的历时研究是该领域中积累最为丰厚的分支。吕叔湘（1985）《近代汉语指代词》系统梳理了近代汉语指代词（含人称代词）的演变轨迹，是这一领域的奠基之作。此后，蒋绍愚（1994）、冯春田（2000）、王永超（2009）等从不同角度考察了近代汉语人称代词的整体面貌。专题研究亦成果斐然：吴福祥（1994）考察了“自己”和“自家”从名词到反身代词的语法化路径；董志翘（1997）、蒋冀骋（2015）、卢玉亮（2022）围绕第三人称代词“伊”的来源与演变持续讨论，揭示了“伊”从指示词到人称代词的渐变过程；薛少春（1998）、梅祖麟（2004）分别考察了“他”及第三人称代词系统的历史演变。复数标记方面，李永（2003）考察了汉语人称代词复数标记的历史层次，龙国富和满丹（2021）对“们”的来源与演变进行了新的探讨。此外，刘云和周晨萌（2013）、周志峰（2003）分别考察了敬称“您”和“令尊”类称谓形式。上述研究的一个共同特征是研究对象基本局限于汉语内部，较少涉及汉语与周边少数民族语言的比较与互动。

综上，汉语人称系统研究在范畴界定、形态句法描写和历时演变三方面成果丰硕。但研究对象基本局限于汉语内部，较少将汉语人称系统置于与周边少数民族语言的接触与比较框架中审视。广西作为汉语与壮侗语、苗瑶语长期深度接触的典型区域，汉语人称系统在接触中发生的变化尚未得到系统回答^[3]。

二、壮侗语与苗瑶语人称系统研究

壮侗语与苗瑶语人称系统的研究始于20世纪早期的调查记录。赵元任（1930）的瑶歌记音是最早的苗瑶语人称形式记录之一，虽然篇幅不大，但保留了珍贵的历史语料；李方桂（1936）对武鸣壮语的记录则较为系统，涉及音系和基础词汇，其中包含

的人称代词形式为后续的共时描写和历史比较提供了重要参照。

20世纪50年代，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为壮、侗、苗、瑶等民族创制文字，带动了一批参考语法的编写。张济民（1963）的苗语语法、韦庆稳（1985）的侗壮语语法、倪大白（1990）的台语概论、张均如（1992）的拉珈语研究、舒化龙（1992）的瑶语研究等均在语法系统描写中涉及人称代词。刘立峰（2020）对凌云壮语的参考语法代表了较晚近的成果，对壮语人称代词的形式与功能做了较为系统的描写。汉民对比方面，曹翠云（2001）的汉苗语比较、张元生和覃晓航（1993）的汉壮语比较开始将少数民族语言纳入与汉语比较的视野。词汇研究方面，欧阳澜（2017）对瑶语核心词的研究、陈孝玲（2019）对侗台语核心词的研究在核心词比较中涉及人称代词。这些参考语法和词汇集虽非专题性的人称系统研究，但为人称代词的共时面貌提供了基本的描写框架和可资比较的原始材料。

近年来专题研究逐渐增多，标志着研究深度和广度的双重提升。曹翠云（1988）较早对苗瑶语第三人称代词进行了历时考察。李锦芳（1995）对西林壮语人称代词的细致描写涉及数范畴与敬称。林亦等（2007）考察了壮语汉达话的人称代词。韦景云（2013）发现壮语黄齐话通过屈折手段区分“本格”和“变格”发现壮语黄齐话通过辅音、元音和声调的屈折手段将人称代词分为“本格”和“变格”，揭示了壮语内部在格范畴上的类型差异。何彦诚（2014）发现红丰佬佬语第一、第二人称有强调式与简缩式之别。杨遗旗（2014）考察了黎语人称代词。覃凤余等（2016）对田阳巴别壮语在数范畴、包括/排除式、敬称等参项上建立了较为系统的分析框架。跨语言比较方面，魏清（2005）、洪波（2016）、杨光远（2019）等对壮侗语内部不同语言的人称代词进行了比较。

总体而言，该领域从早期记音走向参考语法附带描写、再走向专题性考察。但存在两个局限：其一，绝大多数研究聚焦于“人称代词”，对同样承担三身指代功能的普通名词、专有名词、指示词+名词等形式关注甚少；其二，研究多集中于壮侗语内部或苗瑶语内部的比较，汉语与壮侗语、苗瑶语人称系统的跨语言系统比较尚付阙如^[4]。

三、区域类型学与广西语言研究

区域类型学存在两条主要路径：Dahl（2001）的“纯粹分布法”侧重于类型特征的地理分布；Nichols（1992）的“历史类型法”强调从历史接触视角解释区域特征的形成。两条路径的互补性——前者回答“特征如何分布”，后者回答“分布何以形成”——为人称系统的区域研究提供了完整的分析框架。

跨语言比较与大规模语料的使用是该领域的方法论基石。Dryer（1989）首次论证了世界存在大型语言区域；Siewierska（2004）指出人称代词不是人称指示的唯一形式。国内方面，竟成（1996）通过跨语言语料考察了汉语人称代词；李蓝（2008）考察了443个汉语方言的复数表示法，是规模最大的汉语方言人称调查；王聪（2016）基于历时演变和类型学角度分析了汉语人称代

词；盛益民（2017）考察了中国境内语言的包括性问题^[5]。

东亚和东南亚作为典型“语言区域”一直受到学界关注。Bisang（1996, 2006）、Comrie（2007）等论证了该区域作为语言区域的存在及其类型学特征。吴福祥（2016, 2017）系统介绍了区域类型学的原则与方法。Helmbrecht（2013）指出，由于礼貌原则制约，全球有7种语言存在第二人称代词回避现象，且都集中在东亚和东南亚一带，表明人称系统中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在该区域可能具有特殊类型学意义^[6]。

广西地处东亚和东南亚大陆交界，是研究语言接触的天然宝地。孙宏开（2015）讨论了东亚语言接触与语言变化。唐七元（2022）指出广西是研究语言接触的天然实验室。已有研究注意到广西境内语言的区域特征由语言接触导致，但人称系统的区域特征尚未纳入考察范围。

四、现有研究的不足与未来展望

综合以上三脉文献，广西境内语言人称系统的研究在三个层面均取得了重要积累，但有效整合尚未完成，存在三方面明显欠缺。第一，对象欠缺。现有研究侧重于多理论、多视角下人称代词的分析，对普通名词、专有名词、指示词+名词等其他承担三身指代功能的名词形式关注甚少。人称系统不等于人称代词系统——这一认识虽已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Siewierska 2004），但在广西语言的具体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体现。第二，比较欠缺。汉语人称系统研究与壮侗苗瑶语人称系统调查之间缺乏有效的对话与整合。汉语研究多聚焦于汉语内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多集中于单一语言点或同一语族内部，汉语与壮侗语、苗瑶语人称系统的跨语言系统比较尚付阙如。第三，区域欠缺。虽有研究指出广西语言具有区域特征、人称系统具有名词性和区域性，但“哪些词汇承担人称指代功能”“这些功能呈现怎样的区域相似性和多样性”“这些区域特征如何形成与演变”等问题尚未深入考察。区域类型学的理论工具在广西语言人称系统中的具体运用仍处于起步阶段^[7]。

上述欠缺指向三个明确的未来方向：其一，从单一人称代词

描写转向多词类人称编码的整体考察。应将视野从“人称代词”拓展至所有承担三身指代功能的词汇形式，包括普通名词、专有名词、指示词+名词结构等，在统一参项框架下描写各类形式的人称指代功能及其使用条件。其二，从个案调查转向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的跨语言系统比较。应在统一分析框架下，对广西境内汉语、壮侗语和苗瑶语的人称系统进行系统跨语言比较，识别语言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进而分析其演变路径。其三，从特征描写转向区域分布模式与演变动因的综合解释。应运用区域类型学的理论工具，考察人称特征在广西境内的地理分布模式，并结合语言接触与文化影响的双重视角，探讨其形成原因与演变机制^[8-12]。

上述三个方向共同指向一个更为根本的学术命题：在区域类型学视角下实现广西境内语言人称系统描写与解释的统一。广西作为三大语群长期交汇的区域，为人称系统的区域类型学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天然实验室。未来研究如在统一参项框架下系统考察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人称系统的共时特征与历时演变、区域相似性与多样性及其形成动因，将不仅填补广西语言人称系统区域类型学研究的空白，也将为语言接触理论和区域类型学提供基于中国语言事实的实证案例^[13]。

五、结语

广西境内语言人称系统的研究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已走过近一个世纪。汉语人称系统研究从早期分类走向多范畴精细分析与历时深耕；壮侗苗瑶语人称系统调查从早期记音走向参考语法描写与专题性类型学考察；区域类型学理论的引入则为跨语言系统比较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视野。

然而，研究在对象、比较和区域三个层面均存在明显欠缺。展望未来，从单一人称代词描写转向多词类人称编码的整体考察，从个案调查转向跨语言系统比较，从特征描写转向区域分布模式与演变动因的综合解释——三个方向的协同推进，有望为广西语言人称系统的研究打开新的空间，也将为语言接触与区域类型学理论的深度融合提供基于中国语言事实的经验基础。

参考文献

- [1] 黎锦熙. 新著国语语法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24.
- [2] 李方桂. 武鸣壮语记略 [J].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6, 6(2): 183-218.
- [3] 李锦芳. 西林壮语人称代词研究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3): 76-81.
- [4] 吕叔湘. 近代汉语指代词 [M]（江蓝生补）. 上海：学林出版社，1985.
- [5] 罗黎明 主编. 广西民族语言方言音词汇 [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 [6] 欧阳澜. 瑶语核心词研究 [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7.
- [7] 唐七元. 广西汉语方言同源词研究 [M].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22.
- [8] 韦庆稳. 壮语语法研究 [M]. 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
- [9] 韦树关、黄如猛 等编著. 广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M]. 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21.
- [10] 吴福祥. 从区域语言学到区域类型学 [J]. 民族语文，2017(3): 3-19.
- [11] 赵元任. 瑶歌记音 [J].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 1(3): 287-306.
- [12] 中央民族学院苗瑶语研究室编. 苗瑶语方言词汇集 [M]. 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
- [13] 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第五研究室编. 壮侗语族语言词汇集 [M]. 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